

戴复古生卒年考辨

张 继 定

一、生年考补

关于南宋江湖派诗人戴复古(字式之,号石屏)的生年,戴氏在自己写的诗中有过说明^①:

圣朝开宝历,淳祐四年春。生自前丁亥,今逢两甲辰。黄梁一梦觉,青镜二毛新。七十八岁叟,乾坤有几人?(《石屏诗集》卷四《新年自唱自和》)

按:此诗是戴复古于理宗淳祐四年(1244)春节期间所写。这一年是甲辰年,上一个甲辰年乃孝宗淳熙十一年(1184)。戴氏自谓“生自前丁亥”,即是淳熙十一年前的丁亥年——孝宗乾道三年(1167)。这一年距淳熙十一年已有18载,至下一个甲辰年——淳祐四年,诗人正好是七十八岁。

第二年,诗人又有诗说及自己的年龄:

衰年百病身,淳祐五年春。尘世自多事,风光又一新。……七十九岁叟,时吟感寓诗。年高胡不死,身健欲何为!……(《石屏诗集》卷四《新岁书怀四首》)

戴氏自述的生年,亦可从他同时代的友人吴子良于淳祐三年(1243)所撰的《石屏诗后集序》^②中得到证明。文中曰:

……虽然,此旧日石屏也。今则不类。行年七十七矣,焚

香观化,付断简于埃尘;隐几闭关,等一楼于宇宙。

淳祐三年,上推77年,正是乾道三年丁亥。据此,戴氏生于孝宗乾道三年(1167)应是没有疑问的。文学史家也都是这么记述的,有些文学史专著、论文及词典仅以公历纪年,则径将戴复古的生年写作“1167年”,向无疑义。

然而,笔者几年前在反复研读戴氏写的两首五律之后,忽然感到,说戴氏生于孝宗乾道三年固然无可辩驳,径把戴氏的生年写成公历1167年却是不确切的,也是不恰当的。事实上,戴氏生于公元1168年,而非公元1167年。

且看戴复古写的两首诗。其一曰《生朝对雪,张子善有词为寿》:

焚香拜天贶,满眼是瑰琦。腊月雪三尺,春风梅数枝。登楼忘老态,对酒展愁眉。争唱阳春曲,山翁醉不知。(《石屏诗集》卷五)

另一首是组诗《斗山子王深父作〈石屏记〉为老夫书,其文甚佳,采〈记〉中语作五诗致谢》之四:

细读《石屏记》,堪嗟老病身。谁知饥欲死,曷取寿长贫。雪片丰年瑞,梅花腊月春。今朝一杯酒,谁道是生辰。(《石屏诗集》卷四)

张子善、王深父(斗山子当是其号)都是诗人之同乡朋辈。他们在诗人生日的时候,或填词,或作记,为之祝寿。二人写的词或记今已不传,但从诗人写的答谢王深父的这组诗的内容可知,王深父在记中曾将诗人比作“名山”,将其诗比作“金石之声”,高度赞扬了诗人的非凡人品和诗才。这一组诗实是我们了解诗人思想和生平经历的重要材料之一。同时,从上引二诗亦表明,诗人的生日是在“腊月”即阴历十二月,也就是说,诗人是在孝宗乾道三年丁亥的十二月某一天诞生的。按照中西历对照表推算,乾道三年丁亥十一月十九日已是公历1168年元旦,而十二月(腊月)一日至三十日(除夕),公历

为1168年1月12日至2月10日。因此,戴复古生年,按阴历,固然是宋乾道三年丁亥,而按公历计,则是1168年;若论其出生年月日,则在公元1168年1月12日至2月10日之间。现代众多的文学史著作、文学家词典和论及戴复古的有关文章在介绍戴氏生年时,之所以都将它定为公元1167年,就因为著者只看到了农历和公历的对应的主要一面,而忽视了由于历法制定标准和方式的不同,两者还有不对应的一面,尤其是在阴历十一二月间,公历可能已经进入新年。

这一问题,笔者在几年前的一篇短文中已经谈到,指出戴复古生于宋乾道三年丁亥十二月,按中西历对照表推算,已是公元1168年,而不是通常所认定的1167年。也许该文不起眼,所见者少,或是人微言轻,未被人们所注意,据我所知,近几年来有关著作或论文言及戴复古之生年,用公历纪述时,依然写作“1167年”。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。这里谨趁撰写本文之时,连带再次提及,希望能引起学界的注意。

二、卒年考辨

戴复古的卒年,古代文献上缺乏明确的记载,方回《瀛奎律髓》说他“寿至八十余”^③,但未曾确指他何时辞世。有关学者往往根据自己所能看到的文献资料及对它们的理解,推断戴氏的卒年。这样,就难免产生种种歧说。据笔者所知,关于戴复古的卒年,至今有以下几种推测:

1、公元1246年。蔡宝定、张可求、吴茂云编的《石屏诗词三百首》(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)主此说。

2、公元1248年。陈高宽等主编的《宋词大词典》(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)、程千帆、吴新雷主编的《两宋文学史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)等主此说。

3、公元1250年。游国恩等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1月第1版)、廖仲安等主编的《中国古典文学辞典》(北京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)等主此说。

4、公元1252年。张炯等主编的《中华文学通史》(中华书局1997年9月第1版)、胡俊林《永嘉四灵暨江湖派诗传》(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)等主此说。

以上几种推测,都在年份后面打了问号,说明这些推测没有很大的把握,表现了推测者的某种谨慎态度。不过既然持此种看法而不是另一种,相信总有其一定的依据。只是后三种推测的提出者均不见有过什么论证;第一种推测虽然有过论述,但看来论据并不充分。因此,似有必要对这几种看法作一番推考,希望能有助于对戴复古卒年的合乎事实的推定。

为什么认为戴复古可能卒于1246年?持此说者的理由是:“戴复古晚年居家,每年的岁旦总要做几首诗纪念。……‘我已八十翁,此身宁久绊。诸君才杰出,玉石自有辨。’这里可看出他已年高八十。此后未见再有诗,也许这首诗就是绝笔诗了。看来,他的卒年大约是淳祐六年(1246)。”^④文中所引的这首诗,见于《石屏诗集》卷一《懒不作书,急口令寄朝士》。同卷《和郑润甫提举见寄》亦有“痴生年八秩”之句。这说明戴复古八十岁(时当淳祐六年)时还活在世上,但并不能据此推断他即在这一年去世。1993年前后,在戴复古的家乡(今浙江省台州温岭市)发现了七十年代村民拆坟平整土地时出土而被搁置的一块碑石,上面刻有戴复古所撰的《宋故淑妇太孺人毛氏墓志铭》。这在当地文物部门、文史学界引起了轰动。这篇新发现的研究戴复古及其宗族的重要史料,不仅推翻了学术界一直认为戴复古之父戴敏为宋进士戴舜钦之从侄、戴复古是戴丁(叶适曾为其撰写墓志铭)的族兄的论断,纠正了以往被一些学者误排的戴氏宗族上下辈份的承接关系,而且明确提供了戴复古在淳祐六年十一月后还活在世上的证据(鉴于此篇新发现的戴氏所撰墓志铭一般读者不易看到,特将该文附载于本文之后,以供读者参阅——笔者注)。论者以为这一年以后“未见再有诗”,所以“他的卒年大约是淳祐六年(1246)”,此说亦有未然。第一,未见再有诗,不

等于此后不曾写过诗,从其诗集中可考知,他一生至少写了二千首诗,只是流传下来的已不到一半;退一步说,即使自那一年后他没有再写诗,也不等于他即已离世,或许因得重病而不能提笔了呢?

其实,戴复古于淳祐六年(1246)之后并未搁笔。这从《石屏诗集》卷七《寄上赵南仲枢密》二首七绝即可探知。且看其第一首七绝:

贵为公相不如归,一夕飘然去不知。乐在五湖风月底,扁舟载酒对西施。

诗题中的赵南仲,即赵葵(1186——1266),潭州衡山人,抗金名将赵方次子。少随父抗金,与兄范在蕲、邓州等地屡败金军。以军功补承务郎,知枣阳军。绍定间,与范击杀叛将李全,有战功。进兵部侍郎。端平元年(1234),权兵部尚书、京湖制置使,统兵欲复河南,失利而归。嘉熙元年(1237),为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。这一年,年届七十一的戴复古从江西北上扬州拜访赵葵,受到他的热情款待。戴氏离开扬州返家前写的一首七律《见淮东制帅赵南仲侍郎,相待甚厚,特送买山钱,又欲刊〈石屏诗〉置于扬州郡斋。话别叙谢》,充分反映了赵葵对诗人的超常的尊重、关心以及诗人的无比感激之情,从中不难看出二人关系之深厚。考《宋史·理宗纪》,赵葵于淳祐七年(1247)丁未四月被特授枢密使兼参知政事,后又于淳祐九年二月甲辰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。据此,可知《寄上赵南仲枢密》这两首七绝当写于赵葵淳祐七年四月担任枢密使之后,淳祐九年升任右丞相之前,不然诗题中就会以丞相相称或丞相、枢密兼称而不会单称枢密而不及丞相了。此诗的主旨是规劝赵葵急流勇退,辞官归隐,以避朝廷权力斗争的风险,思想情感不免消极。但这与戴复古返家归隐后的思想却是相合的。也许戴复古已经预感到赵葵在朝廷处境之艰险,出于对朋友政治命运的关切,而寄呈上此七绝。果然,赵葵出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仅一年,就被人参奏,以非儒臣而罢为观文殿学士,封冀国公,以武安军节度使致仕。可惜此后我们未能再发现戴复古与赵葵联系的信息。

这样看来,戴复古卒于1246年之推测是可以排除了。那么前列的后三种推测又如何呢?比较起来,笔者以为还是卒于1248年至1250年之间的推测相对接近于事实。一是这个推测与方回关于戴复古“寿至八十余”的说法较相符合,一是他在这段时间(至少是在1247年至1249年间)还写过诗。除了前引的《寄上赵南仲枢密》七绝外,另有五律《萧飞卿将使赴湖北戎幕,诗送其行,兼简秋壑贾总侍二首》(见《石屏诗集》卷四)大约也写于此时。萧飞卿是诗人的年轻朋友,秋壑即贾似道,台州临海人,与诗人同郡。淳祐元年(1241)贾开始任湖广总领,淳祐三年(1243)后加户部侍郎。据《宋史·理宗纪》,淳祐六年(1246)九月贾又接替刚逝世的孟珙任京湖制置使、知江陵之职,淳祐九年三月又进为京湖制置大使。当时他的专权卖国行径尚未暴露,在江湖诗人中有一定声望,刘克庄、戴复古等诗人对他也颇为推重。戴诗中有“鄂渚三千里,遥遥望使星”之句,称贾似道为“使星”,表明此诗当写于淳祐六年九月之后至淳祐九年(1249)贾似道担任京湖制置使、知江陵府这段时间。此后,尚未发现或考证出戴氏新写的诗作。所以,戴复古卒于1248年至于1250年之间的可能性较大,卒于1252年的可能性则较少。

笔者不清楚戴复古卒于1252年的推测是根据哪方面的史料。也许是《石屏诗集》卷三有一首诗评赞戴昺《东野农歌》(东野系戴昺之号)的缘故吧。该诗标题颇长,可说是一篇诗序:“侄孙昺以《东野农歌》一编来,细读足以起予。七言有‘汲水灌花私雨露,临池叠石幻溪山’;‘草欺兰瘦能香否,杏笑梅残奈俗何’,似此两联,皆自出新意,自可传世。然言语之工,又未足多,其体格纯正、气象和平为可喜。余非谀言,自有识者。因题其卷末以归之。”据戴昺《东野农歌集自序》^⑤云《东野农歌集》编定于宝祐元年(1253),于是论者以为戴复古应是卒于评赞《东野农歌集》之诗编成后的某年前后。其实不然。四库馆臣曰《东野农歌集》世有两种版本,“一为两淮所进,题曰‘戴东野诗’,只一卷,乃附录《石屏集》后者;一为浙江所进,分为五卷,其编

次稍有条理,而诗视两淮本较少数篇……”^⑥。从《石屏诗集》及其所附《戴东野诗》可知,戴复古自嘉熙二年(1238)春回到家乡隐居,直至离世前的十多年间,与当时侄孙辈包括赋闲在家的戴曷来往密切,时有唱和。在《东野农歌集》最后编定之前的这十余年间,戴曷实际上已经着手在编撰这一诗集。戴复古题品的那卷《东野农歌》,只是戴曷初编的一卷,其中收有不少与戴复古酬唱之诗,它们大多写于淳祐元年(1141)至八年之间。淳祐的最后两年即淳祐十一年(1251)、十二年(1252)及宝祐元年(1253),戴曷均在池州秋浦做幕僚,为属官。他在池州任上所作的诗以及最后编定《东野农歌集》之后写的自序,均没有提到过戴复古,更未见与他相互唱和之事,想来那时戴复古业已去世,自然不可能见到最后编定的《东野农歌集》并为之题品了。因此他为戴曷初编的《东野农歌》题品的那首诗,也只能写于淳祐十年(1250)之前。可见,如果以《东野农歌集》的最后编定日期来推测戴复古卒于1252年,也是不足为据的。

综上所述,关于戴复古的卒年的四种推测,第一种1246年说和第四种1252年说基本可以排除,中间两种推测即1248年说和1250年说比较接近于事实。当然若要把戴复古的去世的时间锁定于某年,尚需进一步发掘有关文献。戴复古去世后,江湖诗人武衍曾有诗悼之^⑦,刘克庄《跋二戴诗选》^⑧亦言及戴复古之离世事,但二人在诗文中均没有说明戴氏的卒年,也没有标示诗、跋的具体写作时间。现代有的著作为谨慎起见,对戴复古的卒年干脆打一个问号了之。这固然也未尝不可。但能探知与其卒年更为接近的年份,毕竟是戴复古研究工作的一个进步。我们相信,随着南宋文史研究特别是戴复古研究的深入,戴复古的卒年之确切答案终有一天会彻底揭开。

附录:宋故淑妇太孺人毛氏墓志铭^⑨

余族侄丁,字华父。之妃曰毛氏,名仁静,家黄岩之丹崖。其父廷佐,以儒学望于里,故孺人习闻其训,陶染与性。成,既归,克尽妇道,

以贤淑称。仪止山立,节操玉洁,是非不涉于言,喜怒不形于色,动循礼法,暗合女诫。羸衣羹饘,祇以振贫,一毫不费于释氏,非介然有守者莫能。华父自少与余为忘年交,相见必倾倒。尝为余言:妇人之所以难克者,妒为大。山妻贱性不妒,比之传记所载谢安、王导、任瑰、裴谈之徒之妻,制勒其夫如束湿者,殆霄壤。叔处吾族,曾闻其有指尖妒悍声出房闼乎?繇是人益多之。呜呼!其他可能也,其不妒为难能也。能为其难,岂非贤妇也哉!年八十七,逢国锡类恩,封孺人。生于绍兴甲戌九月壬子,卒于嘉熙庚子十二月甲午。子男四:楷、木、栝、栩。栩先孺人六年卒。女三,嫁其侄从政郎前绍兴府嵊县主簿仁厚,进士曾建大、王修。孙男八:宜老、双老、大老、冲老、君锡(编者注:原件此处下空一字)、敕赐童科免解进士颜老、宗凭、伟老。大、锡、颜、伟俱蚤夭。女十,郑蕃、陈观光、郑居礼、陈应梦其婿也,余在室。曾孙女三。以淳祐六年十一月壬申祔葬于戴奥。华父兆前事,楷等款门乞铭,余虽不任载笔,谊不得辞,况又平时所乐道者。铭曰:自《小星》之诗绝响,为妇者类以妒相师,甚至专房擅宠,祸移彼姝,宁灭祀而不悔。闻孺人之风,可以愧死矣!

族叔祖石屏樵隐戴复古撰

玉山林琼夫刻

注:

①本文所引戴复古之诗均出自四部丛刊续编弘治本《石屏诗集》。

②见四部丛刊续编弘治本《石屏诗集》。

③《瀛奎律髓汇评》卷二十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。

④《石屏诗词三百首》第165页,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版。

⑤⑥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《东野农歌集》。

⑦武衍此诗题曰《悼戴式之》,见武衍《适安藏拙余稿》(乙稿),《南宋群贤小集》(读画斋重刻本)。

⑧见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卷一百九,四部丛刊本。

⑨句读系笔者所加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